

性别视角下的英帝国史研究*

傅新球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英帝国史与妇女史是历史研究中两个平行发展的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学术路径和话语体系。然而,在 80 年代之后,这两个研究领域出现了“相遇”和交叉。一方面,英帝国史在各种新兴学术思潮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向复兴,并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帝国史叙事的“新帝国史”。另一方面,新兴的女性主义史学开始影响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并介入英帝国史,成为催生“新帝国史”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英帝国史和妇女/性别史的学术回顾入手,对性别视角下的英帝国史研究作一初步考察。

一、帝国史与性别史的“相遇”

帝国史的学科发源可追溯至约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的《英格兰的扩张》。1881年至1882年期间,约翰·西利任剑桥大学里格斯现代史讲席教授,他在该系列课程中的讲稿于1883年结集出版,定名为《英格兰的扩张》。西利对帝国发展逻辑及帝国未来走向的系统描述,使其成为后来英国帝国史学家们公认的学科鼻祖。^①

1905年,牛津大学设立贝特殖民史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休·爱德华·伊格尔顿成为第一位贝特殖民史讲席教授,标志着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门类正式出现。他的著作集中讨论了诸如大宪章、议会制、英国法系以及司法传统等在全球殖民体系中的传播,并以美国革命为分界点,着重描述了英第二帝国时期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定居并最终通向自治的历史过程。^②当帝国联合会(League of Empire)成立历史学分会时,伊格尔顿与阿尔伯特·波拉德(Albert F. Pollard)、约翰·伯里(John B. Bury)等人一同成为它的重要成员。在他们的主持下,大量有关于英帝国史的论著得以出版,相关的教科书也应运而生,由此出现了一场名为“帝国研究运动”的风潮。^③

1919年,剑桥大学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相继设立。这两个讲席及牛津大学贝特殖民史讲席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正如戴维·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所说,传统帝国史的经典确立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的《剑桥帝国史》是其集中体现,该书旨在“解释宗主国从弱小的欧洲社会,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国社会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JJD7700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殷之光《帝国史中的辉格暗影》,《读书》2019年第10期;《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

② Hugh Edward Egerton, *Federations and Union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Clarendon Press, 1911.

③ 施华辉、周巩固《书写帝国——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发展成世界强国的过程和原因,并分析这种扩张对宗主国及殖民地的重要性”。^①传统的帝国史理论家们比较重视殖民官员的统治,所以一般都是在法律、制度、殖民政策、军队、战争这些层面展开讨论,对种族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对性别、科学知识以及学科如何帮助建构帝国等方面很少涉及。^②

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非洲大部分地区从英国取得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最终从其余殖民地撤出,这一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使得英帝国寿终正寝。在“帝国的终结”的氛围下,人们对帝国的关注度下降,作为一门学科的帝国史也呈衰微之势。但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后,人们对英国人身份的日益关注,重新燃起了对种族问题的担忧,媒体和公众对1982年马岛战争的支持,以及“殖民统治的怀旧”(Raj nostalgia)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让英国的帝国历史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帝国史作为“非殖民化敏感性的延迟到来”的产物,它与新的学术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结合在一起,将英国和它的帝国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研究领域中来。这样,帝国史研究在英国得到复兴,其中尤以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的“帝国主义研究”系列丛书最为瞩目。这套丛书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总编辑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的开拓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干劲。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帝国主义研究在重塑英国和帝国历史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③

20世纪末以来新兴的“帝国研究”呈现出与传统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不同的面貌,人类学、女性主义开始被引入帝国研究,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成为一个紧密相联的分析整体。它通过开放性的研究,在吸纳与整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观念的基础上,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幅复杂的帝国历史的动态图景。因此,尽管帝国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在传统帝国史研究中,女性与性别问题并没有纳入帝国史家们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兴的妇女/性别史却强势地介入到帝国史之中,使性别叙事成为“新帝国史”中一个重要向度。

在传统史学中,妇女成了历史叙述的“失语者”。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欧美的一批女权主义学者开始着眼于“她史”的建构,将妇女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从而兴起了妇女史学。

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推动了妇女史学的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妇女史在美国兴起,然后迅速扩展至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世界。1976年,妇女史学家琼·凯利-加多(Joan Kelly-Gadol)发表《性别的社会关系》一文,主张把社会性别看作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她指出“性别关系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然属性。”^④很多女权主义者也开始使用“社会性别”(gender)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史学家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⑤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女性主义妇女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人们不再把研究视野只局限于女性,也不再将女性视为一种没有个体差别的群体,而是从差异与两性的视角出发,主张书写一种注重“差异”的社会性别史。^⑥

通过妇女/性别史的研究,广大被遗忘的女性开始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女性在历史书写中逐渐

① David Fieldhouse, "Can Humpty 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2/2(1984), pp. 10-11.

② 黄晓武《帝国研究——刘禾访谈》,《国外理论研究动态》2003年第1期。

③ Andrew Thompson, *Writing Imperial Histor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

④ 琼·凯利-加多《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页。

⑤ 琼·W. 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175页。

⑥ 刘文明《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变得可见”并慢慢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总体而言,20世纪下半叶新兴的妇女/性别史具有以下特点:在研究对象上,由上层妇女转向普通妇女,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冲破了妇女参政运动史的框框,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妇女的日常生活、婚姻家庭和观念意识等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视角上,不再将妇女当作历史进程的“受害者”,而是强调妇女自身的独立意识与文化,突出她们在历史中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在研究方法上,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后殖民理论等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倡导的“赋予历史以性别”观念及其研究实践,对历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学者称之为历史学的“性别转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新帝国史”也深深打上了性别的烙印,上述妇女/性别史研究的特点,也渗透到帝国史研究中来。

二、帝国史研究中的性别维度

在最初的帝国史研究中,不管是研究帝国主义者、拓殖者,还是研究被殖民地的臣民,女性都未曾出现在历史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后,新帝国史的研究使妇女和性别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出现了许多研究性文集或著作。例如,安·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的《帝国皮革》^①,对帝国历史中的跨国广告和商品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解读,发掘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历史乃至贸易保护和爱国主义等各种因素,从女性主义和性别角度分析大英帝国的文化表征。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的著作《种族与欲望的教育》^②受福柯的启发,把性话语和种族话语放在帝国统治的大都会中心和它的殖民地边缘之间去理解。将性别维度纳入帝国史研究框架,或者说将女性史研究纳入帝国史框架,使帝国史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如下几个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的成果和影响,在此予以简要介绍。

(一) 殖民地男女两性生活研究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帝国白人人口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高。大量英国妇女来到殖民地工作,成为医生和护士、酒吧服务员和仆人、农场工人以及许多其他行业和职业的从业人员。许多人以单身女性的身份来到这里,希望能在殖民地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赚到更多的钱。如何从殖民地生活来理解妇女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菲利普·列文主编的《性别和帝国》一书探讨了男人和女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如何影响帝国历史的进程,从性别视角论证了殖民统治者和被殖民者在建设帝国中的实践和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该书以性别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并不是预先假定所有妇女或所有男子都有共同的殖民地实践经验。相反,这个分析工具所表达的是“与性别差异相关的多重而矛盾的意义”,以及这些多重性如何塑造和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同时强调阶级和种族等重要差异在其中所起的重要影响。^③

海伦·卡拉威的《性别、文化和帝国:殖民统治下尼日利亚的欧洲妇女》,将尼日利亚的欧洲女性置于“帝国文化”及其权力和知识的普遍模式之下进行分析,通过对女性文档——回忆录、书信、专业报告的考察,描述了尼日利亚专业领域的欧洲女性(卫生保健人员、教育官员、医生、殖民行政管理人員、福利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讲述了这些欧洲女性力图超越殖民地等级制度和性别规范的限制

①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quest*, Routledge, 1995.

② Ann Laura Stoler,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Philippa Levine ed., *Gender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制,在专业和志愿工作以及社会生活中跨越种族界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力图在一个陌生世界里赋予生活以意义和联系的故事。^①

(二) 殖民帝国中的女性移民研究

随着学者们对女性、性别和帝国相关主题兴趣的增加,结果是对成千上万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移民到殖民地和自治领的英国女性的经历、身份和角色的关注。詹姆斯·哈默顿(James Hammerton)1979年出版的《移民的淑女:1830—1914年上流社会的贫困与女性移民》是较早对英国女性移民进行研究的著作。^②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出版了大量专门论述这一主题的书籍、论文和文章。^③在这些论著中,移民身份、定居者社区等成为关注的中心,它们围绕着“白人”、国家、帝国、阶级和文化等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与性别关系相交叉并由性别关系所塑造展开分析。詹姆斯·哈默顿后来的研究也受到这一取向的影响。他认为,在英帝国的移民策略中,性别维度一直是其特征的基础,反映了英国主流的性别意识形态和假设,以及定居者社会的演变。尤其是在政府直接干预移民模式的地方,如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区和创造新社会的行为本身总是使社会和家庭形成的优先形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最明显的是,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下,导致了帝国对“社会工程”的刺激,例如控制性别比例和确保男性定居者获得女性服务——家庭服务、性服务和生殖服务。^④

也有学者尝试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女性移民的跨国历史,《帝国代理人》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该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英国女性在不同国家和国际背景下迁移的情况。通过对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利益相关方围绕女性移民的互动进行研究,该书为帝国移民的性别政治提供了洞见。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是英国有帝国意识的中上层妇女,她们通过帮助英国妇女移民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致力于帝国事业的发展。该研究挑战了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男性事业的假设,它把移民到国外的女性描述为不仅是帝国的代理人,而且是“帝国女性化”(“empire feminization”)的代理人。当然,作者也批判性地认识到,这些女性移民的组织者及女性移民群体坚定地认为“英国人优越于其他民族”,单身女性移民是为了改变“边疆”(frontier)空间,改造“未开化”的居民。女性移民的组织者试图通过精心管理英国女性移民来创建她们理想的帝国,作为文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传播者及实践者,这些女性移民社团的成员想象自己是新帝国秩序中的关键角色。她们对一个女性化的帝国的愿景,是由一种明确界定的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所决定的。而移民海外的女性群体所从事的工作也被高度性别化——女仆。因此,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大英帝国,女性帝国主义

① Helen Callaway, *Gender, Culture and Empire: European Women in Colonial Nigeria*, Macmilla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College, 1987.

② James Hammerton, *Emigrant Gentlewomen: Genteel Poverty and Female Emigration, 1830-1914*, Croom Helm, 1979.

③ 主要包括: Julia Bush, *Edwardian Ladies and Imperial Pow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mousi, *Depraved and Disorderly: Female Convicts,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Colonial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ion Diamond, *Emigration and Empire: The Life of Maria S. Rye*, Garland Publications, 1999; Stephen Constantine, ed., *Emigrants and Empire: British Settlement in the Dominions between the War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Gothard, *Blue China: Single Female Migration to Colonial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ita Kranidis, ed., *Imperial Objects: Essays on Victorian Women's Emigration and the Unauthorized Imperial Experience*, Twayne Publishers, 1998; Kranidis, *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 Contested Subjects*, St Martin's Press, 1999.

④ A. James Hammerton,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Philippa Levine ed., *Gender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6.

者协会组织的形成并不是为了挑战现存的性别划分。^①

(三) 殖民帝国中的女性传教士研究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妇女宗教职位开始复兴,许多修女和女执事通过教派关系参与到传教活动中来。到20世纪初,基督教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组织者、女性传教士和女性皈依者推动的。但无论是正式的传教工作记录还是学术研究,都忽视女性在传教活动中的关键作用,传教运动中妇女和性别的历史一直处于“隐性”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女性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她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致力于通过对传教运动中女性作用的研究来纠正女传教士长期处于“隐身”的状况。^② 这些研究包括追踪妇女在传教项目中的中心角色以及传教运动与妇女运动的交集,并将传教工作定位于更大的社会变迁与专业化背景中,使中产阶级妇女得以从家庭领域和妇女大众的社会与政治组织中涌现出来。^③

朗达·A. 桑普尔(Rhonda Semple)、乔斯林·玛瑞(Jocelyn Murray)、彼得·威廉姆斯(Peter Williams)、塞西利·斯旺斯兰德(Cecillie Swaisland),以及罗斯玛丽·西顿(Rosemary Seton)等学者的论著研究了招募女传教士的过程,揭示了性别和阶级规范如何使女性的专业传教工作合法化,展示了宗教文化如何为女性提供了行动和赋权的环境,深化了对帝国传教史的研究。^④

(四) 殖民帝国中的性/性行为研究

罗纳德·海姆(Ronald Hyam)是较早将性问题置于帝国史研究中的学者。他的《帝国与性》一书的中心观点是,帝国无论好坏,它都为殖民者提供了一系列的性机会,性是帝国主义的特权之一。帝国时期的性接触机会使艰难的环境对殖民者更有吸引力。^⑤ 他关于卖淫的文章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同主题研究开辟了道路,他所肯定的阳刚之气和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成为帝国主义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自从海姆的著作出版以来,帝国史中性与性别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他的著作仍然是性与帝国主义历史研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里程碑。与海姆观点不同,女性主义史学家菲利帕·列文(Philippa Levine)认为,性是帝国政治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的帝国政策问题和“殖民焦虑的关键场所”。在殖民地,肆无忌惮的性行为威胁着帝国和文明的堡垒,需要加以规范和管理,这种约束和控制以改变非西方人群性行为的愿望是帝国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和延续英国优越性思

① Lisa Chilton, *Agents of Empire: British Female Migration to Canada and Australia, 1860s - 1930*,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2007.

② Clare Midgley, "Can Women be Missionaries? Envisioning Female Agenc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2006), pp. 335 - 58.

③ Elizabeth Prevost, "Assessing Women, Gender, and Empire in Britain's Nineteenth-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History Compass*, 7/3 (2009), pp. 765 - 799.

④ Rhonda Anne Se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Boydell and Brewer, 2003; Jocelyn Murray,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799 - 1917", in Kevin Ward and Brian Stanley, eds., *The Church Mission Society and World Christianity, 1799 - 1999*, W. B. Eerdmans, 2000, pp. 66 - 90; C. Peter Williams, "'The Missing Link': The Recruitment of Women Missionaries in Some English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Fiona Bowie et al., eds., *Women and Missions: Past and Present*, Berg, 1993, pp. 43 - 69; Cecillie Swaisland, "Wanted-Earrest, Self-Sacrificing Women for Service in South Africa: Nineteenth-Century Recruitment of Single Women to Protestant Missions", in Fiona Bowie et al., eds., *Women and Missions, Past and Present*, 1993, pp. 70 - 84; Rosemary Seton, "'Open Doors for Female Labourers': Women Candidat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75 - 1914", in Robert Bickers and Rosemary Seton, eds., *Missionary Encounters: Sources and Issues*, Curzon Press, 1996, pp. 50 - 69.

⑤ 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it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nald Hyam, "Empire and Sexual Opportunity",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4/2 (1986), pp. 34 - 90.

想及其实践的关键。^①

辛哈(Mrinalini Sinha) 的《殖民的男子气概》(*Colonial Masculinity*) (1995) ,克莱尔·米奇利(Clare Midgley) 的《性别与帝国主义》(*Gender and Imperialism*) (1998) ,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 的《性、政治与帝国》(*Sex , Politics and Empire*) (2006) ,以及克里斯蒂·里德的(Kirsty Reid) 《性别、犯罪与帝国》(*Gender , Crime and Empire*) (2007) 等著作将注意力从帝国为殖民者提供性满足的机会转移到印度社会和立法改革的性征化(sexualisation) 辩论上,认为性别是殖民经验、殖民地道德纯洁运动和早期殖民边疆多样化的性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和塑造者。^② 海姆、米奇利、辛哈、菲利普斯和里德等人的著作阐述了如何从性别视角解读帝国史。海姆主要强调殖民地社会中的性,即个人的生活经历。米奇利重新考察了一个将性别包含在内的帝国史。辛哈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性与帝国的关系,以及英国和印度殖民精英态度的共同点与差异。里德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性问题在殖民地政治体系中传播的动脉系统。^③ 帝国史研究成果中还有很多与性相关: 比如卖淫问题、性对殖民地个人事业和公共生活的影响问题、殖民者的性焦虑问题等。

(五) 殖民帝国中的性别/性别气质研究

从英国人在爱尔兰建立欧洲第一个“殖民地”开始,帝国强权和民族国家的思想就既明亦暗地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性别及两性气质文化的塑造联系在一起。

克莱尔·米奇利的两本著作^④将英国妇女的激进主义定位于帝国背景之下,记录了女性改革者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工作,她们作为英国中产阶级白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首次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性别抗议形式及其对妇女权利的文化影响,是全面研究英国帝国时期的女性激进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它们既反映了帝国政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也暗示国内战线对帝国权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对充分理解现代英国帝国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米斯彻(Miescher) 等主编的论文集从广泛的时空范围考察了帝国的性、身体、社会、物质、政治、文化的性别维度,探讨自从欧洲帝国主义出现以来,性别和性行为是如何在一个日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世界中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这些文章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对工作、衣着、物质文化、娱乐、流动性、激进主义、政治想象和反抗的性别的历史进行了探讨。文集阐释了个人赋权、自我表现、集体团结和战略动员的性别化和性化特征。这些论述都强调性别和性行为在各种全球交流中的中心地位,这有助于引发进一步的讨论。^⑤

该文集中关于性别气质的研究,可以简·麦凯布(Jane McCabe) 的论文为例予以说明。麦凯布探讨了1908年至1938年间,一群英裔印度混血儿被赶出他们在印度东北部卡林邦(Kalimpong) 的家到新西兰农村地区生活的经历。这些混血儿被看作是帝国互动中一种有问题的产物,他们被迫参与帝国体系中的另一种交换——满足殖民地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通过这样做,他们可以证明自己比

① Philippa Levine, “Sexuality, Gender, and Empire”, in Philippa Levine, ed., *Gender and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5.

② Andrew S. Thompson ed., *Writing Imperial Histor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

③ Robert Aldrich, “Sex Matters: Sexuality and the Writing of Colonial History”, in Andrew S. Thompson, ed., *Writing Imperial Historie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5.

④ Clare Midgley, *Wome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 – 1870*, Routledge, 1995; *Feminism and Empire: Women Activists in Imperial Britain, 1790 – 1865*, Routledge, 2007.

⑤ Stephan F. Miescher, Michele Mitchell and Naoko Shibusawa, eds., *Gender, Imperialism and Global Exchanges*, Wiley Blackwell, 2015, p. 13.

传统的“娘娘腔”印度男人更健壮,而且他们可以找到比在印度更好的经济机会和社会融合。然而,这个一举两得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英裔印度混血儿受过教育,对男子气概有着更高雅的理解,他们在新西兰农村经历了与粗鲁的、拓荒的白人定居者类型的男子气概的文化冲突。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以雇佣工人或小商人的身份找到工作,实现了社会融合。由此,麦凯布的研究揭示,这种将英裔印度混血儿培养成吃苦耐劳的帝国公民的设想,在新西兰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性别和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限制。

(六)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判

进入20世纪8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出现了新的学术命题和研究焦点,形成了被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分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和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对欧美女权主义者中存在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进行批判。莫汉蒂将“第三世界妇女”放入“殖民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指出了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与学术研究中的霸权主义特征。此后,莫汉蒂继续阐释其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她从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出发研究社会性别,认为社会性别的形成和再造与种族的形成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演变相互交织在一起。^①斯皮瓦克集中阐发了她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在她看来,作为底层的女性,是在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女性。她强调女性在帝国与精英叙事中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庶民女性的话语权被剥夺。^②庶民研究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揭示和显现被精英主义史学掩盖、遮蔽和本质化的那些差异化、多样性的历史。^③

20世纪90年代,在考察英帝国史时采取后殖民转向取向的著作,在主题的广泛性和观点的新颖性上的确引人注目。因为差异的多样性,关于性别和种族的研究也与阶级密切相关,所以,在帝国框架内民族认同形成的政治学,以及关于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政治改革和公民权的争论,尤其是关于种族和性别问题的争论,也成为新帝国史的研究主题。^④当然,帝国史研究中获誉最高的,是那些将文化与性别、种族、阶级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成果。

对以上几个研究领域的介绍只是笔者阅读材料中的体会,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它们并非能够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从以上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来看,帝国史研究不仅借用了女性史研究的“社会性别”视角,更是将“新社会史”研究的“眼光向下”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帝国的扩张、统治、解体等历史过程更为丰满和生动。正如杜芳琴所指出的,由于“社会性别”维度的引入,使得以往未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如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以及对性别气质的规范等凸显。另一方面,因为性别维度的介入,为历史注入了活力和“人气”。^⑤的确如此,帝国史研究因纳入“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傅新球,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 410081)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李桂芝《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赵静《后殖民女性主义中的流散身份》,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1页。

③ 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

④ Ida Blom, Karen Hagemann and Catherine Hall, eds., *Gendered Nations: Nationalisms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Berg, 2000; Nira Yuval-Davis, *Gender and Nation*, Sage, 1997.

⑤ 杜芳琴《妇女/社会性别史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